

第四章 尋找農村教育的出路

從一九三七年開始，陝甘寧邊區的教育一路走來充滿了困難，一九四〇年以後隨著客觀條件日益惡化，普及教育的計畫不得不慢下腳步，甚至呈現倒退發展的趨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環境條件明顯不足的情況，中共也依然沒有放棄普及教育的理想，一九四〇年開始的「新文字運動」和一九四四年的「民辦公助」便是基於這樣的理想而產生。不顧環境的困難，堅持推動大規模教育，中共的作為顯得十分不切實際，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正是因為環境的困難才激盪出這些實驗性與革命性兼具的教育措施。姑且不論效果和評價，中共在戰爭時期所推動的一連串教育措施，不僅展現出中共的理想性格，也展現出務實和彈性的行事風格，兩者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節 新文字運動

中共推行新文字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三六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年初，第二階段則是從一九四〇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底，當中曾停頓了二年左右。

新文字源起於蘇聯的「拉丁化」文字運動，最早用於蘇聯境內少數民族的文字改革，瞿秋白、吳玉章和林伯渠等人以這一套拉丁字母為基礎，在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系統，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間曾在上海「左聯」的推動下，引發一陣「拉丁化運動」的風潮，但在國民政府的禁令下很快的銷聲匿跡。¹國統區內的「拉丁化運動」無法生存，不過在中共盤踞的陝北則是受到重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當時的陝西省教育部設立了「新文字訓練班」，²該年冬學便使用新文字教授成人識字，³一九三七

¹ 有關拉丁化文字和「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源起見，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72 年），頁 54-61。

² 〈陝西省教育部創辦新文字訓練班〉，《紅色中華》，1936 年 11 月 30 日。

年五月在延安市成立「新文字促進會」，⁴以後識字運動、夜校都有新文字教學。到了一九三八年初，邊區已經有定期出版、每期發行六、七百份的新文字報紙，並有三十多種新文字通俗讀物，據估計受過新文字教育的學生約有二千人。⁵許多跡象顯示，中共不僅將新文字運用在社會教育上，也計畫在小學教育中實施，例如，一九三七年二月創設的「魯迅師範」在早期據稱完全用新文字上課，⁶而在一九三八年初編輯完成的初級小學課本中也可以見到以新文字拼注的生字表。⁷

新文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取代漢字，成爲一般民眾學習語文的工具。漢字難學是許多人共同的想法，筆畫眾多、複雜，形、音、義的聯結不易，讀寫學習需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成爲推動教育的一大困難，早從清末開始便不斷有人研究漢字簡化和拼音化。吳玉章和瞿秋白等人所制訂的這一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以二十八個拉丁字母爲基礎制訂二十六個子音和三十六個母音，再以子音、母音的組合來拼讀並書寫中文。⁸對於學生而言，拉丁化的文字只要學會二十八個字母和基本的拼讀規則便能具備基本的書寫和閱讀能力，尤其直接從文字上可以拼讀出字音，與漢字需一字一字學習相較自然是要容易許多。理論上新文字比漢字更容易推廣學習，不過漢字拼音化雖然早已有許多研究成果，但利用拼音字母來進行大眾教學卻是前所未有的經驗，該如何開始當時的意見相當紛歧。《新中華報》從一九三七年初開始有許多推行新文字的討論，有人主張新文字的功能應只限於掃除文盲，但也有人

³ 〈開展冬學運動〉，《紅色中華》，1936年12月13日。

⁴ 皇甫東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1927.8—1949.9)》(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20。

⁵ 呂良，〈邊區的社會教育〉，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12-13。

⁶ 〈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頁212。

⁷ 董純才主編，《初級小學國語課本》第3冊，(陝甘寧邊區教育廳，1938年4月初版)，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藏，523.841/478/5192 V3。

⁸ 吳玉章，〈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吳玉章傳編寫組編，《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頁619-20。

認為新文字應該普遍推廣，已經識漢字的人同樣要學新文字，否則就成了新文字「文盲」；有人主張以漢字為主，新文字為輔，用新文字來輔助漢字學習，但有人認為應以新文字教學為主，等到新文字已有基礎後再視情況教漢字。⁹

推行新文字在當時顯然引發了不少爭議，反對意見應該也不少，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央教育部發出「繼續推行新文字」的指示，似乎是針對反對聲音所作的宣示，¹⁰不過現實上遇到的困難卻讓新文字的推動開始有了變化。一份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報告提到了新文字推展的幾個問題：民眾不易接受，尤其是農村民眾懷疑新文字是洋文，對於學習新文字有所疑慮；幹部不足，教員太少，很難發揮廣泛的效果；讀物太少，民眾學會了新文字卻沒有讀物可看，「學了也是無用」。這份報告的作者最後建議：先學新文字，學會新文字後馬上學漢字。¹¹依一九三七年九月的指示，無論識字或政治教育的教材都應使用新文字，但該年底冬學識字課程教育廳卻準備了漢字和新文字兩種教材，由各地方「依情況自行決定」採用何種教材。¹²再從一九三八年出版各種識字課本來看，課文內容均為漢字，只有課文生字表中注有新文字，¹³顯然漢字為主、新文字為輔的意見已經佔了上風。

新文字有著易學的優點，對於文化水準低落、學習環境不佳的邊區廣大農村來說是快速提升識字能力的好方法。不過經過短暫的推動後，中共官員很快發現建構一套新文字系統所牽涉的問題層面十分廣泛，想解決這些問題其困難度可能不亞於傳統的識字教育，加上當時邊區教育正處於快速成長的

⁹ 有關《新中華報》上討論新文字的文章，見〈對於教學新文字的意見〉，《新中華報》，1937年3月19日；〈我對於新文字運動的意見〉，《新中華報》，1937年4月23日；楊其華，〈關於消滅文盲〉，《新中華報》，1937年5月23日、6月3日。

¹⁰ 〈繼續推行新文字運動〉，《新中華報》，1937年9月9日。

¹¹ 呂良，〈邊區的社會教育〉，《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12-13。

¹² 〈陝甘寧邊區中央教育部關於冬學的通令〉，《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2。

¹³ 這些課本包括，董純才著，《新千字文》第一、二冊(陝甘寧邊區教育廳，1939年)；劉御編，《識字課本(冬學用)》第一冊(陝甘寧邊區教育廳，1938年)；及《識字課本--給識字小組用的漢字》第二冊(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1938年)。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藏，528.4384/478/5096 v1，528.4384/478/6345 v2，528.4283/3875/05279 v1，528.4384/819/5342 v2。

樂觀氣氛之中，邊區政府對於教育的推動顯得信心十足，因此對爭議頗多的新文字便逐漸失去了興趣。一九三八年以後新文字的推行逐漸沉寂了下來，雖然識字課本上仍有新文字的拼注，但已經看不到邊區政府任何推動的指示和討論，一直到一九四〇年，邊區教育的推展出現瓶頸之後，新文字才又重新成爲話題。

在第三章曾經提到，邊區政府曾在一九三九年底提出小學的「普及教育三年計畫草案」和社會教育「消滅文盲三年計畫草案」，這兩個計畫雖然最後都無疾而終，但是邊區政府顯然已經在爲教育發展瓶頸尋找出路。過去幾年的教育推展不僅數量無法突破，實質的效果似乎也十分有限。從可見的資料來看，每年的小學畢業生不過數百人，而邊區政府對於社會教育學生畢業一直沒有明確的標準，也從來沒有完整的數字統計，成效顯然也是有限。在教育規模無法擴大，教育效果又不佳的情況下，中共開始尋求突破的方法，於是一度被冷落的新文字這個時候被視爲普及教育的一條捷徑。一九四〇年四月教育廳宣佈開辦「社會教育人員訓練班」，新文字出現在訓練課程內容中，¹⁴八月的三科長會議決定以後社會教育的識字將以新文字爲主。¹⁵十月，邊區師範開辦的冬學教員訓練班加入新文字課程，教育廳並決定派出「新文字冬學輔導團」協助該年在延安市和延安縣開始試辦的新文字冬學。¹⁶十一月「新文字協會」成立，幾乎所有中共黨政要員均名列發起或贊助名單之中，成立大會上宣佈要用新文字來開展冬學、國民教育和社會教育。¹⁷十二月，邊區政府宣佈從一九四一年起新文字與漢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可用在公文、文書、帳目、單據上，政府的一切佈告、法令也將漢字、新文字併用。¹⁸

¹⁴邊區教育廳，〈關於各師範學校附設社教人員訓練班事項的訓令〉，(1940年4月25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463。

¹⁵〈邊區教育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20。

¹⁶〈邊區師範冬學教員訓練班加緊工作〉，《新中華報》，1940年10月13日。

¹⁷〈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即將成立〉，《新中華報》，1940年10月3日。

¹⁸〈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推行新文字的決定〉，《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157。

從上述的各種動作看來，中共下定決心大力推動新文字，這個決定似乎也得到多數政府高層成員的支持。一九四一年各地方「新文字協會」陸續成立，大規模的新文字運動正式展開。四月，以陝北公學學生為基礎成立「新文字幹部學校」。¹⁹七月，為了該年大規模的新文字冬學運動，教育廳在十二個縣辦理「新文字冬學教員訓練班」，訓練時間三個月，畢業學生有四百三十人。²⁰除了社會教育外，小學教員訓練開始加入新文字課程，部分小學也陸續有新文字的實驗教學。²¹根據一九四〇年冬學的經驗，一般漢字冬學畢業人數只有 12%，但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市、縣實驗的新文字冬學畢業人數達到了 45%，²²新文字的掃盲效果有顯著的優勢。受到這個結果的鼓勵，邊區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大規模開辦新文字冬學，成為整個新文字運動的高潮。受到經濟困難的影響，一九四一年的冬學比起往年規模略小，但在困難的情況下仍然計畫開辦四百個冬學，除了少數作為實驗對照用的漢字冬學外，大多數為新文字冬學。²³

中共對新文字的期望頗高，也為新文字運動投入相當多的心力，不過一九四一年冬學結束後的檢討卻發現效果不如預期。教育廳的報告指出，新文字在某些地方，例如志丹和延安，有高達 50% 的學生順利畢業，但較差的地方，如延川和慶陽，卻只有 12% 到 15% 的學生畢業。²⁴再從延長縣的例子來看，一九四〇年的漢字冬學有 16% 的學生畢業，一九四一年新文字冬學有 19% 學生畢業，²⁵新文字的效果似乎並不十分顯著。從各方的報告來看，新文字

¹⁹ 繼祖，〈新文字幹部學校成立計劃〉，(1941 年 3 月 27 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453。

²⁰ 邊區教育廳，〈一九四一年新文字冬學教員訓練班工作總結〉，(日期不詳)，《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53。

²¹ 〈延安小學教師訓練班圓滿結束〉，《解放日報》，1941 年 3 月 23 日；及〈新文字運動小學實驗〉，《解放日報》，1941 年 9 月 21 日。

²² 〈一九四〇年冬學工作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55。

²³ 蕭云，〈新文字冬學裏的幾個問題〉，《解放日報》，1941 年 11 月 4 日

²⁴ 〈邊區教育廳總結新文字冬學工作〉，《解放日報》，1942 年 3 月 30 日。

²⁵ 延長縣，〈呈送兩年來的教育工作報告〉，(1942 年 5 月 25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9。

的效果不如預期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冬學無法正常進行教學。在延安，新文字的推展有各級幹部的關照和配合，收效良好不足為奇，但其它地方的幹部顯然就沒有這樣的熱情了。以被評為效果最差的延川縣為例，原本計畫冬學為期三個月，但開學時秋收未畢，無法動員，秋收完畢又要運鹽，開學只得一延再延，²⁶無論是幹部還是學生都沒有太多心思在冬學工作上。此外，民眾對於新文字的疑慮並未消失，許多人認為新文字不是中國的文字，甚至覺得和日本人說的話有點像，連地方幹部都有「不正確認識和不好的言論」。²⁷就技術層面來說，仍在實驗階段的新文字還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吳玉章便承認新文字對於中文特有的四聲和同音字詞特多的情形還沒有一套固定的解決方式。²⁸實際應用的結果也發現新文字並沒有想像中的好學好用，例如延川就反映該地的方音唸新文字有困難，而且在沒有漢字基礎的情況下，雖然能讀寫許多字，但卻不知道意思，名詞只能拼出，但不能解釋，寫起文章來也文意不通；即便學會了，也因為缺乏使用機會和閱讀材料，很快便忘記了。²⁹

建構新的文字系統需要相關的配套措施，教員必需重新訓練，教材必需重新編印，甚至報紙、各種出版品都必需配合大量出版，但是在當時困難的環境中，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是十分奢侈的事。從各方提出的檢討可發現，一九三八年曾經出現的問題在一九四一年仍然存在，顯示新文字的推行確實有許多必需要努力克服的心理和實質障礙。持平而論，新文字的推動才剛起步，短暫推行的經驗其實還很難為新文字作出正確的評價，不過對於中共而言，大費周章的結果卻不能得到預期成果，推動新文字的決心似乎也開始動

²⁶延川縣，〈一九四一年冬學工作總結〉，(1942年2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59。

²⁷延川縣，〈冬學初次檢查報告〉，(?年12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60；及新文字輔導團，〈延長縣新文字輔導團兩個月冬學報告〉，(1942年2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401。

²⁸吳玉章，〈新文字在切實推行中的經驗和教訓〉，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吳玉章傳編寫組編，《吳玉章文集》，頁647-48。

²⁹見延川縣，〈新訓班四月工作總結〉，(1941年11月4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470；及延川縣，〈一九四一年冬學工作總結〉，(1942年2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59。

搖，「新文字報社」的「精簡」便是一個明顯的徵兆。「新文字報社」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並在十一月開始以一周一期的方式出版《新文字報》，發行量最大的時候曾經一期出版一千五百份，報社社長是人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雖然只是一個報社，但是從工作內容來看，「新文字報社」幾乎等於是新文字運動的負責單位，除了《新文字報》外，還要編寫各種課本讀物、翻寫政府佈告、教授小學教師訓練班、指導各單位新文字學習，並回答各地來信有關新文字的各種疑難問題。³⁰負責這麼多的事務，但是「新文字報社」的編制人數在最多的時候也只有九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精兵簡政」開始後更被要求精簡為二人，以致於吳玉章向教育廳抗議「無異於不做」。³¹吳玉章的抗議經教育廳轉呈邊區政府後得到了「由文協改組後重新配備人員」的批示，後續究竟如何發展不得而知，但是新文字運動最重要的機構，在新文字運動才剛起步便成為精簡的目標，已經為新文字的命運留下伏筆。

一九四二年七月，《解放日報》報導延安新文字幹部學校學生會對去年新文字冬學的檢討，認為新文字推行範圍太廣，學校太多，成效不大，浪費人力，並建議今後要抓中心地區，集中力量，³²顯示新文字運動已經開始收縮。九月，教育廳發出的冬學指示中雖然要求「去年辦過新文字冬學的地區，今年還應繼續開辦新文字冬學」，³³但在十月的另一份指示中又宣佈該年新文字冬學將以延安縣為中心，教育廳不再派人赴其它縣支援，³⁴新文字的推動退回了起點。一九四三年，新文字幹部學校併入延安大學，成為社會科學院中的「新文字系」，³⁵一九四四年以幹部缺乏為由宣告暫停，新文字的普及教育理想正式畫下句點。

³⁰ 新文字報社，〈工作報告書〉，（1941年9月2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451。

³¹ 邊府教育廳，〈新文字報社應再增加人員問題的呈文〉，（1941年12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451。

³² 〈新幹校學生會檢討新文字運動〉，《解放日報》，1942年7月25日。

³³ 〈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關於一九四二年冬學的指示〉，《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44-5。

³⁴ 〈今年新文字冬學以延安縣為中心〉，《解放日報》，1942年10月20日

³⁵ 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北京：科學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304-05。

第二節 私學與「民辦公助」

一、鼓勵私學

學校裁減和新文字運動收縮之後，邊區政府對於大規模群眾教育的態度由積極轉為消極，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央政治局決議，幹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³⁶到了一九四三年二月教育廳明白指示，邊區教育實施方針第一在職幹部教育，第二學校幹部教育，第三社會教育，第四國民教育。國民教育部分，主要力量放在完全小學，其它小學適當合併，並改強迫動員為勸學，³⁷過去積極的普及教育政策已經不復存在。一九四三年是邊區教育發展最黯淡的一年，小學教育一路裁減，這時學校數只剩下一九四〇年高峰時期的一半，如果扣掉一九四〇年新建八個縣的數字，邊區小學教育實際上已經退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準；³⁸至於社會教育方面，雖然優先順序還在小學之前，但一九四二年已經沒有完整的官方統計數字，而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每年舉辦的冬學運動也在這一年中斷，社會教育幾乎已經是處於停頓的狀態。

教育緊縮造成邊區學校和學生數大幅減少，影響最大的是農村地區的教育。教員難覓，學生動員不易，學校設備簡陋，這是大部分農村學校的寫照，也正是教育廳眼中的不合格學校。農民對於學校所帶來的人力、經費負擔一向頗多怨言，裁掉這些學校其實正符合地方民眾的期望，只不過中共對於農村教育的真空狀態似乎總覺得過意不去，為了彌補緊縮政策的影響，邊區政府在裁併小學的同時，也宣佈獎勵並提倡私人講學作為補救的措施，允許教

³⁶ 〈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上)，頁 197。

³⁷ 皇甫東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1927.8—1949.9)》(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243 頁。

³⁸ 〈去年工作總結 今年工作計畫大綱〉，《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364。在一九四二年時這八個縣的小學校數佔全邊區約 40%，以此比例推算一九四三年原邊區範圍內小學數只有四百多所，比起一九三七年秋的五百多所要少了許多。

會社團設立學校，贊助鄰里興辦私塾，並確定在不違反抗日救國的最高原則下，私學的宗旨、學制、課程、組織機構和教學實施，政府不加以法令上的干預，³⁹一九四二年冬學指令也有獎勵私立冬學或私塾式社教活動的指示。⁴⁰

邊區政府鼓勵私學的宣示得到一些回應，各地陸續有私學設立的消息，不過邊區政府很快便發現，私學的發展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問題。以一九四二年八月子長縣一件私學申請案為例，一群在瓦窯堡市的「較富」群眾因為對現行小學不滿，所以申請辦理私學，並且打算讓學生從公立小學退學轉入私學。⁴¹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兩個問題，首先，申請辦學的是市鎮中「較富」的群眾；其次，私學所吸收的學生是原有公立小學的學生。依邊區政府的想法，獎勵私學原先是為了要補公立學校的不足，尤其是讓地處貧僻、動員不易的地方能借私學延續民眾的基礎教育。但是居民經濟能力不佳、人力需求緊迫的農村顯然並沒有成立私學的能力，反而是人口集中的城鎮地區爭相成立私學，結果和公立小學成分庭抗禮之勢，反而影響了公立學校的發展。邊區政府曾經宣示不干涉私學細節運作，但私學的發展顯然已經出乎原先的意料，於是教育廳對於子長縣這件私學申請作出以下的批示：所有私學一切規程應依據邊區現行教育法，向縣政府呈請備案，受三科領導。教材需用邊區課本，不得用四書五經，除非距離學校遠，否則縣立小學學生不得轉學至私學，而且高小學生不得轉學。⁴²

二、從「私學」到「民辦」

一九四二年以後推動的私學對於普及教育的功用並不大，不僅無助於農村教育的改善，反而妨礙了公立小學的發展，這點似乎連邊區政府自己都覺

³⁹ 〈提高邊區國民教育〉，《解放日報》，1942年1月14日。

⁴⁰ 〈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關於一九四二年冬學的指示〉，《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45。

⁴¹ 子長縣，〈請求創立私塾的呈文〉，(1942年8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239

⁴² 邊府教育廳，〈關於公民請求創立私學給子長縣批答〉，(1942年8月1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239

得懊惱，不過從私學宗旨、學制、課程、組織機構和教學實施上彈性規定來看，中共已經開始針對過去「正規化」的一些問題作出修正，嚐試為普及教育另闢蹊徑，也促成日後「民辦公助」推展模式的蘊釀成形。一九四四年三月在紀念陶行知「生活教育運動」的座談會上，「民辦公助」的方針正式提出，⁴³接著幾個試驗性質的「民辦」小學在延安成立，四月，邊區政府發出「提倡研究範例及試行民辦小學」的指示信，要求每縣至少試辦一處，並逐漸將現有公辦小學轉為民辦小學。⁴⁴

所謂「民辦公助」，簡單的說便是由地方民眾主導學校的設立和運作，官方則只負責督導、檢查和必要協助，重點其實是在「民辦」，也是解決各種普及教育問題的中心概念。新的教育方針首先必需解決的就是大規模教育的經費來源。自從一九四一年以後邊區政府便不曾支援地方教育任何經費，大自學校設備，小至學生的課本一律由民眾來負擔，但經費由群眾負擔的結果是惹來更多民怨；私學的推動原希望由私人出資來取代集體分攤，但結果私學大都出現在人口集中、經濟狀況較佳的市鎮中，對於解決農村教育的問題於事無補。正如「民辦」其名，解決經費的方式最後還是回復到過去民眾分攤的模式，因為在政府無力支持的情況之下，集體分擔仍是農村教育較為可行的方式。一九四五年一月《解放日報》上建議了民辦學校經費的十種方式，一是合作社，二是集體生產，三是變工幫教員種地，四是開墾學田，五是以墳地廟地辦學，六是熱心人士捐地，七是群眾團體出資，八是政府出資再逐漸自給，九是合理攤派，十是學生家長負擔。⁴⁵這當中除了合作社是較新的作法外，其餘其實與一九四二年以前「正規化」時期的作法並無不同，不過為了減少辦學對於民眾生計的衝擊，新的政策在學校運作的模式上作了一番改變，希望讓教育的推動能較為民眾接受。

中共一再強調，「民辦」最重要意義在於賦予民眾更多參與學校經營意

⁴³ 〈紀念生活教育運動第十七週年〉，《解放日報》，1944年3月24日。

⁴⁴ 〈關於提倡研究範例及試行民辦小學的指示〉，《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154-158。

⁴⁵ 〈民辦村學解決經費問題的幾種方式〉，《解放日報》，1945年1月10日。

見的機會，讓學校能更適應民眾的需求。爲了減少上學對農村生產的影響，上課時間可以依據學生家中工作的需要而調整爲上午、下午或晚上，必要時還可以請「勞動假」；過去固定的寒、暑假也可以由民眾根據秋收、春耕的需要彈性放假，可以自行決定一年中需上課的月份。在學習的形式上，依地方、民眾和季節的情況，學校的運作可以是固定課程的全日校、半日校、夜校模式，或幾天上一次課的隔日校、數日校或「輪學」模式，⁴⁶也可以是不拘課程、隨到隨教的識字組模式，甚至可以因工作任務的需要，以變工隊、⁴⁷運輸隊等工作編組爲單位，利用工作間隙休息時間來進行簡單的識字或讀報學習。在師資方面，「民辦」小學的教員不再規定由縣政府派任，地方民眾可以就近自行聘請。在課程內容上，只規定學會一千五百字，算術會加減乘除，具備初步的衛生常識和政治常識的學習目標，至於如何安排課程，學習什麼課目，爲了改變過去教育內容不受民眾歡迎的情形，政府並不過問，由民眾的意見來決定。既然課程可以由民眾決定，教材也就可以依地方民眾的要求自編自選，雖然邊區政府仍然堅持不能用「四書」、「三字經」等舊教材，但對於較無害的「千字文」、「百家姓」則並不反對。學生動員方面，新的方針強調以民眾「自願與需要」爲依歸，不再強制動員，學校不再有最低人數的限制，學生當然也就不需要離家住校。⁴⁸

「民辦公助」的目的很簡單，教育仍要繼續，教育經費也要民眾繼續負

⁴⁶ 所謂的「輪學」是由一位教員負責幾個學習組織的教學，有些是教員移動，教完一處後再到另一處，有些則是教員不動，學生輪流來就教員學習。見〈輪流教學的分散形式〉，人民教育社編，《農民識字教育的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北京：新華書店，1950年），頁15-16。

⁴⁷ 「變工」原是邊區民眾之間農業生產工作上的互助行爲，幾個人爲單位，集體在各家之間輪流幫工，目的是讓個別人力不易進行的工作能藉集體的力量來順利完成。在一九四三年「大生產運動」開始之後，中共藉用這樣的傳統編組大規模的「變工隊」來進行大規模的開荒和農業生產工作。有關「變工」的介紹，見〈邊區農村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形式〉，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頁477-79。

⁴⁸ 有關「民辦公助」方針說明見，〈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關於邊區教育方針的決議草案〉，《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440-46；及〈關於提倡研究範例及試行民辦小學的指示〉，《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154-158。

擔，但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則可以依據需要或是能力條件加以選擇。中共說得十分清楚，「民辦」並不是絕對和唯一的方向，如果公辦正規性質的學校成效良好或是得到民眾擁護，仍應繼續存在和發展，⁴⁹但考慮到不同條件，「民辦」的各種彈性規定得以讓「普及教育」的理想在最惡劣的條件之下依然存在。在不拘形式的情形下，從一些範例的介紹中可以看出「民辦」學校發展的幾個趨勢，首先，原先由於學生人數、校舍設備和教員資格的限制，幾個村，甚至一個鄉才能辦得起一個學校，「民辦」之後，學校成立門檻降低，學校以規模小而且分散的「村學」形式出現。其次，「村學」這種教學形式、時間、人數都不限定，而且兼顧生產與學習的運作方式與過去的社會教育措施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因此當「民辦」政策開始從小學教育擴展至社會教育時，許多地方的「村學」逐漸有成人教育與兒童教育合流的現象，過去分別成立、且功能定位不同的夜校、半日校和識字組教學全部融合在「村學」之中。⁵⁰

民辦「村學」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合流的現象與中共在一九四四年以後「幹部教育重於群眾教育」的政策有關。前面提到，一九四三年時中共將邊區教育區分為在職幹部教育、學校幹部教育、社會教育和國民教育，當時便已經提出「幹部教育第一」，到了一九四四年時邊區教育的分類變成「幹部教育」和「群眾教育」兩類，於是有了「幹部教育重於群眾教育」的宣示。⁵¹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被歸於國民教育的小學教育在新的分類方式中被一分為二，高級小學被歸類為「幹部教育」，而初級小學則和社會教育同被歸類為「群眾教育」。在「幹部教育重於群眾教育」的政策之下，高級小學仍維持「公辦」，經費來自縣政府，維持正規的課程和運作，為了讓畢業學生更適於到社會上擔任工作，甚至可以將修業年限加以延長，⁵²教育目標是呈現向上提升的趨

⁴⁹ 〈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關於邊區教育方針的決議草案〉，《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446

⁵⁰ 〈新教育方針收獲大一文教大會教育組研究現狀〉，《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465-67。

⁵¹ 〈論普通教育中的學制與課程〉，《解放日報》，1944 年 5 月 27 日。

⁵² 〈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關於邊區教育方針的決議草案〉，《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440-441。

勢。至於地方上的初級小學，在師資、教材、教學時數沒有一定標準的情況下，顯然是將教育的目標和品質全面向下修正，只能以「普及」為重點。

方針確定了，具體運作過程則是在幾個試驗學校成立過程中累積經驗，這些學校的經營方式也就成了日後「民辦」學校的範例。一九四四年十月，邊區召集各級幹部四百餘人，開始了為期三十六天的「文教大會」，會中檢討了邊區教育的歷史，批判過去所發生的錯誤，並且提出一些典範學校的成功案例為「民辦公助」的方針定調。配合該年重新開辦的冬學運動，一場大規模的教育動員於是展開，「民辦公助」的推動也在一九四四年底達到了最高潮。據統計，在文教大會之後，小學校數達到近一千二百所，學生數三萬四千人，參加各種社會教育組織的人數也達到三萬多人，⁵³儼然又回到了一九四〇年前後的空前盛況。不過正如過去所有的政策推動一樣，「民辦公助」一開始的成功是得力於當時所有人的關注，邊區政府不僅派下「文教工作組」到各地協助推動，也從延安派學生到各地支援教員人力，⁵⁴而各地幹部在邊區政府的強力宣導和動員之下顯然也感受到了壓力，「把一半時間和力量放在教育工作上」，許多地方甚至又回復到過去抄名單、強迫動員的作法。⁵⁵

過去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民辦公助」的推展獲得極佳的效果，Mark Selden 甚至認為陝甘寧邊區的教育是在「民辦公助」之後才真正廣泛的深入農村，發揮教育的功能，⁵⁶但從當時的各種情況來看，一九四四年底的「盛況」其實是在特殊條件下所產生暫時現象。「民辦公助」方針十分清楚，政府不可能有太多餘力來支持地方教育，因此無論是支援教員或是派遣「工作組」都是為

⁵³小學的統計數字見，江隆基，〈關於民辦公助政策的初步總結〉，《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376。社會教育統計數字見，邊區教育廳，〈三年來社會教育概況〉，（1946 年 10 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693。

⁵⁴以三邊分區為例，該年冬學共有教員二百二十名，當中由民眾自聘的只有一百名，有六十名由三邊公學的學生下鄉支援，剩下的六十名則是來自延安大學學生的支援。見〈三邊分區一九四四年冬學工作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268。

⁵⁵邊區教育廳，〈三年來社會教育概況〉，（1946 年 10 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693。

⁵⁶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68.

了動員、掀起熱潮的一時作法，運動期間一過，各種作法勢必要恢復正常，平時工作忙碌的地方幹部也不可能再花「一半的時間和力量」在教育工作上，這時「民辦公助」的考驗才真正開始。一九四六年教育廳為「民辦公助」政策以來的社會教育作一檢討，當中提出的數字顯示，全邊區參加社會教育的民眾在一九四四年底的冬學運動期間有三萬人，但到了第二年變成一萬人，一九四六年則只剩五千餘人，⁵⁷「民辦公助」的推動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過去學者們對於「民辦公助」的樂觀看法顯然受到了「文教大會」前後情形的誤導。

究竟「民辦公助」成效如何？除了當時一些宣傳報導和事後的典型介紹外，相關的材料相當少，這使得後來的人很難對「民辦公助」作出正確的評價，但從這些有限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民辦公助」的許多辦法過於理想化，很難接受現實條件考驗。本文第三章中曾經就經費、設備、師資、教材和學生動員等幾個面相來探討一九四二年以前的邊區教育的問題，如果同樣以這幾個條件來檢視「民辦公助」，可以發現當中除了設備的因素影響較小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困難依然是難以克服的。從經費來源來看，前面提到的十種解決經費辦法，其實仍是由地方群眾來負擔，過去民眾對經費負擔迭有怨言，「民辦公助」之後顯然也不可能改變。合作社辦學是這一時期較新的作法，由學生家長在入學時出資入股，藉著合作社持續經營所得利潤作為學校的固定經費來源。⁵⁸繳交一次股金後便可解決經費負擔的問題，表面上看來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不過這樣的學校顯然只適合人口集中、學生較多、而且合作社經營有基礎的地方，對於學生較少、沒有合作社經營基礎的農村地區並不適合，勉強辦起來以後的結果是賠本「垮台」，反而更引起不滿。⁵⁹

從一般的情形來看，村學經費的解決甚至要比過去來得棘手，因為若要

⁵⁷邊區教育廳，〈三年來社會教育概況〉，(1946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693。

⁵⁸合作社辦學的典型是位在延安市的溝門小學，相關介紹見，〈南區教育合作社創辦合作紡織學校〉，《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下)，頁377-379。

⁵⁹邊區教育廳，《國民教育資料》，(1946年10月13日)，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藏，520.27/7155/04987。

全村攤派，沒有子弟上學的人家不高興；若要全由學生分攤，由於學校規模普遍比起過去小學要小，學生人數更少，均攤的結果負擔更重，再加上分散彈性的形式，學生來去不定，該如何分攤又是一個問題。位在延安的楊家灣小學是最早幾個「民辦」學校典範之一，該校教員描述經費解決的兩個方法，一是由村民樂捐，二是由學生分攤；考慮到學生的能力，地方幹部主張「富的歡迎多出，貧的少出」，實在困難的可以免費，真正不足時還可以得到公家的幫助。⁶⁰根據這一位「模範教員」的描述，楊家灣小學在一片和樂的氣氛中解決了經費的問題，其它地方是否也是如此？根據江隆基的檢討報告，經費籌措仍是「民辦」的大問題，民眾對於出了公糧、教育附加糧，還要出錢辦村學很難釋懷，因此後來有許多地方紛紛要求回歸「公辦」。⁶¹

再從學校的運作來看，「民辦」學校不限制教員資格，降低了師資的門檻，但新的學校形式對教員而言卻是更大的考驗。過去高小、師範畢業的教員，面對單一形式的冬學、小學尚且有管理、教學上的困難，如今的教員在面對成人、兒童混雜，學生來去不定、隨到隨教的教學環境時究竟有多少效果？根據一些典型學校的例子，在沒有課本的情況下，教員會視地方民眾的需要自行設計課程，自編教材，除了識字之外，教算術，教寫收條、路條、借據等「應用文」，還會教基本衛生常識和自然知識，⁶²這對於一般學識不高的教員來說是否有困難？或許中共原意只是要維持最起碼的教育活動，對於民辦教員只有「會什麼、教什麼」的要求，但如果教員能力不足、教學效果不佳，民眾是否願意花錢、花時間上學？過去有邊區政府待遇標準規定、有地方幹部協助動員，教員的生活尚且不能得到保障，「民辦」之後教員的待遇由民眾來決定，如果教學效果不佳，教員的生計是否會有問題？教員的情緒是否受到影響？

⁶⁰陶端予，〈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小學教育典型經驗介紹》（北京：新華書店，1950年），頁4。

⁶¹江隆基，〈關於民辦公助政策的初步總結〉，《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385。

⁶²見陶端予，〈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鮑俠影，〈延安市舊城民辦小學報告〉，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小學教育典型經驗介紹》，頁6-7、頁38-39。

江隆基指出，「建立教師地位」是民辦的重要基礎，不過從他報告中看來，這個基礎實際上是很薄弱的。教員「文化程度不高」、「不負責任」以致於群眾反對、學校垮台，與過去情形並無二致。⁶³在「民辦」的教學中有一大部分是屬於簡單的「識字組」形式，理論上這是對師資要求最低的方式，但即使是這樣的形式恐怕都有師資上的問題。前面提到，一九四四年冬學運動總共動員了三萬人，其中參加「讀報識字組」的有二萬六千人，佔了八成以上。⁶⁴據規畫，「讀報識字組」以民眾工作需要來編組，利用工作之餘由組長帶頭讀報，除了時事教育、政治宣傳之外，並且以報上內容進行簡單的識字。⁶⁵姑且不論報紙的取得有沒有問題，依據過去的經驗，報紙的內容即便是小學教員都不見得讀得通，並非簡單識幾個字便可以勝任讀報的工作，在這些由「勞動英雄」、「生產模範」所領導的識字組中究竟誰有讀報能力？

最後，最關鍵的還是民眾就學意願的問題。「民辦公助」批判過去強迫性質的教育，強調「自願與需要」，要讓民眾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接受教育。雖然中共也強調「自願與需要」是可以創造的，透過幹部的宣傳、解釋、說服讓民眾感受到教育的「需要」，進而「自願」接受教育，⁶⁶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民眾是否能夠感受到教育的需要或是迫切性？「宣傳、解釋、說服」其實一直都是邊區政府對地方幹部再三強調的動員方式，過去這一套作法行不通，如今是否會有效果？過去民眾因為學校教學效果差、生活負擔沉重因此無心上學，如今這些情形是否有所改變？在過去，地方各級幹部缺乏耐心、時間動員，如今在幹部大量被精簡的情況下，是否還有心思來進行說服、解釋？

比起一九四二年來，一九四五年前後的壓力可能減輕了一些，但是無論幹部或民眾顯然依舊必需為生產工作和各種動員而忙碌煩惱。地方幹部「常

⁶³江隆基，〈關於民辦公助政策的初步總結〉，《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286。

⁶⁴邊區教育廳，〈三年來社會教育概況〉，(1946 年 10 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693。

⁶⁵〈一個農村讀報組的創辦〉，人民教育社編，《農民識字教育的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北京:新華書店，1950 年)，頁 45-46。

⁶⁶何哉，〈需要與自願〉，《解放日報》，1945 年 10 月 14 日。

作別的工作，一搞二、三個月，有的一年只做二、三個月的教育工作」；教員常因社會工作而缺課，⁶⁷而待遇由民眾決定的結果，有些教員的酬勞過低，甚至變成無酬的義務職，因此怕「誤工」而不願教學；至於一般民眾依舊必需在秋收、春耕和其它動員工作之間忙碌奔波，即使有間隙時間，身心疲累之下對於上學識字自然提不起興趣。依照中共的說法，所謂的「公助」是要幹部負起教育的方針領導、監督和檢查的工作，不過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下，「需要與自願」倒成了拒絕推動教育的最好理由。許多幹部形容教育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不願者去」、「民辦了公家就不用管，公助就是強迫」，於是地方上的教育不是放任自流、自生自滅，就是成了「形式主義」，有組織、學校之名，但沒有任何活動。⁶⁸

⁶⁷邊區教育廳，《國民教育資料》，(1946年10月13日)，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藏，520.27/7155/04987。

⁶⁸邊區教育廳，〈三年來社會教育概況〉，(1946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693